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6-0785-03

一部淹贯精审、胜义纷陈的八仙研究力著 ——《八仙故事系统考论——内丹道宗教神话的建构及其流变》评介

欧阳江琳

钟吕八仙是一组深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神仙群体,有着广泛的影响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自宋迄今,对于八仙的研究,围绕史实考辨、故事钩沉、宗教文化、民间信仰、八仙文学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全方位的进展,极大地拓展了八仙文化的研究畛域。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吴光正《八仙故事系统考论——内丹道宗教神话的建构及其流变》一书,则是八仙研究最新推出的一本力著。

全书分13章,从钟吕八仙旁生支衍的巨大故事群落中,抽绎出13个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故事,包括八仙群体的庆寿、过海故事,八仙个体之钟离权、铁拐李、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曹国舅、韩湘子等主要故事,清晰地梳理了它们的演变历程、规律及文化特征。是书在材料的裒辑、运用及立论等方面,均颇有建树。笔者近日手捧细读,颇受沾沔之益。于此愿以愚管,窥测匠心,若有益贤者寓目,亦不拂献芹美意。

一本力著的推出决非一日之功,必累积数年,既雕既琢,方能厚积薄发,尤其针对某个故事的考镜源流,更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备历时与共时的资料武库。八仙故事由于横跨宗教、文学、民俗等诸多领域,流播甚广,异变甚多,故相关文献显得颇为复杂、庞杂、零散。作者根据文献载体和分布情形,将它们分为九类:古代传说、道教文献、说唱文学、古代戏剧、古代小说、地方戏剧、民俗文献、美术文献、近现代八仙传说,等等。这不仅包括传统的物质文献,同时也囊括了一些非物质的文献,表明了作者对文献预判较为充分和全面。为做到“论从史出”,立论笃实,作者始终秉持着“竭泽而渔”的资料搜集方式,拉网式地对八仙文献作了一次全面的整理。据序言、后记介绍,作者在动笔之初,不憚繁琐,先后编有500万字的《八仙原始文献》、8万字的《研究文献、原始文献索引》和96万余字的《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并翻译了美国汉学家康豹的专著《多面相的神仙——永乐宫的吕洞宾信仰》(齐鲁书社,2010年)。这些都为该书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是书旁搜远绍,渐渍洽浹,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文献整理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其所引之资料,可以“博”、“新”二字概之。“博”者,即广也,全也。在对13个故事追踪摄迹的系统考察时,作者征引的文献不下数万条,跨诸宗教、文学等文化层面,文本与文物相考证,口头与物质互发明,全面而有力支撑了观点的陈述。作者还热衷于叙录八仙文献所得,为学界深化八仙研究提供一份目录清单。例如,论八仙庆寿故事,共胪列八仙庆寿清宫戏、文人戏和地方戏54种,说唱文学40种;论吕洞宾戏白牡丹故事,共叙录全国各地地方戏53种;论韩湘子仙事,共叙录各地地方戏74种等等,并力求考证每一种戏曲、说唱文学的剧情。而“新”者,即鲜见于前人者也。传统学术研究的拓展,很大程度有赖于新材料的发现,然于前人拓荒已久的领域,新发现实属不易。本书在这方面亦有所创获。例如,作者从金代的墓葬砖雕中发现了八仙图像,从金代的缂丝工艺画中发现了《八仙介寿图》,从而推翻了八仙起源于元代的成说,作者还从全真教宗祖图中发现了八仙的身影,从而有力地论证了八仙与全真教的关系。这些材料的所得,多源于作者广泛的阅读和宏富的积累。

当然,本书并非徒以材料之博、之新眩人耳目,在信手拈来的文献考证中,作者始终贯穿了核心观点的建构——“道教信仰是八仙信仰的最本质特征”,钟吕八仙的信仰是由内丹道教徒所建立,而之后其他文化势力对它的渗透和弘扬,才促成了八仙民俗信仰的产生。

这一观点确乎发前人之所未发。在民间,人们多将钟吕八仙视为一种民间信仰或民俗文化,这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八仙本身所具有的宗教本源特质。而学界对八仙故事的考源亦显得错综复杂,如著名学者浦江清曾指出:“八仙的组成于真正的道教的关系很浅。”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将八仙故事等同民间文学的认识在学界甚至成为识见。然而,钟吕八仙实际是一组具有多元文化品格的神仙群体,它们的故事历经千年的发展,构成了一个涉及宗教、民俗、文学、文艺等诸多领域的庞大的“文化王国”(张锦池序语)。因此,若仅限于民俗文学的考察范畴,显然不能对整个八仙故事求因明变。近些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研究者已逐步突破了这种困限,而《八仙故事系统考论》无疑是论述最为系统的一部书。

本书通过全面清理八仙 13 个主要故事的流变,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揭示。作者发现,大量的八仙故事随着跨时间、跨地域、跨文化的流变,衍生出气象万千的异文故事群落。而它们之所以呈现出强烈的民俗气息,是因为在不同时间、地域的演变过程中被民间大力改造,极大地淡化甚至剥离了原故事的宗教背景,致使后来的研究者往往为这层保护色所障目,从而忽视了对其宗教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的挖掘。作者还更深一步推考,八仙故事的起源实与道教内丹教的宗教理念、法术和仪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钟吕八仙有着各自的仙迹、仙事,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聚合在一起,应是产生于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八仙的聚合当在宋金时期,而此时正是内丹道教盛行之时。作为内丹大家之一的钟离权、吕洞宾,本是唐、五代时人,但在宋、金道教背景下,他们的学说得到大力的弘扬,身份也被打造为内丹道祖师。而有关钟、吕的仙事亦被内丹道教徒加以改造、编造出来,并以二人为首,以度脱为主要方式,逐步形成一个趋向稳定的八仙群体。因此,八仙故事传说的形成,应是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的神话——文学再现。对八仙宗教属性的考源,有助于了解八仙群体构成之原因,廓清钟吕八仙长期以来驳杂不清的真实面目。例如,吕洞宾戏白牡丹故事,目前尚无人系统梳理。这个故事的诸多文本所流溢的大都是调谑、斗智甚而带点色情的民间气息,与吕洞宾道教圣徒的身份颇不相称,很难见出其中所蕴含的宗教品格。然而,从宋、金、元有限的文献材料中,作者细密地爬梳出这个故事的本源,即白牡丹系当时妓女的流行称呼,而吕洞宾曾有浪迹青楼、度脱妓女之故事。这就寻绎出白牡丹与吕洞宾故事相结合的内在机缘,即度脱的道教观念。这一独到发现,端本正源,从而剥去了包裹在故事外层的重重世俗外衣,让我们看清了故事发生的内核。

要强调的是,任何新结论、新发现的产生,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严谨的研究方法之上。本书一方面延续了八仙研究的多元化学术视角,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操作上,规范了更加清晰的原则:“其一,文本文献、考古文献、田野作业相互参证的原则”;“其二,文献、文本和文化三位一体的研究原则”;“其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原则”^[1](第 5-6 页)。这三个原则,与八仙故事的发散性、流变性、多元文化的特质颇相契合,故而使全书能够拥有一个较高视点,客观、灵活地审视和把握新旧材料,以切近八仙故事的源流变化。比如,关于“韩湘子雪拥蓝关”的故事,错综复杂,学界一直难辨原委。当传统文本、文献不能提供这个故事来龙去脉的有力证据时,作者转而将目光投注到这个故事的说唱载体——道情艺术之上。在全方位梳理道情、宝卷、戏曲、小说、弹词、民间唱本等民间田野资料,对比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后,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韩湘子故事的形成和发展,主要跟道教说唱文学——道情有关。《韩仙传》是新经韵的主要作品,随着新经韵演变为说唱道情、道情戏剧而先后渗透到小说、戏剧、宝卷等文学体裁中。”设若没有田野作业的考证方式,没有多学科、多文化的学术视野,这个结论是很难得出的。再如,对铁拐李故事的考证,以前学者多关注铁拐李的“瘸”与“拐”的外在形象,由此考出了拐仙、李八百、刘跛子等诸多原型,但作者不拘成说,翻空出奇,从相同的材料中,重点扣住铁拐李“阳神出壳”的核心问题,从而发现内丹教阳神理论对这个故事的塑造所产生的根本影响。这种“旧瓶装新酒”的见解,无疑得益于宗教文化的新鲜视角。作者认为,“在清理、研究带有宗教色彩的文学作品时一定要结合具体的宗教背景,对其所

体现的宗教特质和理论系统做出准确的把握。”这种理性的认识提醒我们，在面对故事流变的研究时，要把握故事系统形成时所接受的文化影响、所具备的文化品格。

作者在考论中所表现出的淹贯精审，严密逻辑，也使得看起来枯燥的考证过程充满兴味，令人信服。例如，对“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故事的考察，本书可谓抽丝剥茧，鞭辟入里，清晰地抽绎出该故事的原宗教形态。作者通过对比不同文化背景下衍生的文献、文本，指出这个故事实际存在很大的变异。早期吕洞宾与黄龙的故事，体现了两大系统：一者为佛教视野下的参黄龙故事，吕洞宾为黄龙大师所点化，成为禅宗的法嗣；一者为道教视野下的斩黄龙故事，吕洞宾欲以飞剑斩断黄龙的贪嗔痴三毒，后接引黄龙禅师而去。这两大系统的故事，均彰显出强烈的宗教色彩。通过详密的分析，作者找出佛道故事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在于：不同时代的宗教背景下，佛道教徒们为维护各自的教义和地位，刻意对这一故事进行改编，使之体现出禅宗心性理论与内丹道教性命双修理论的内在冲突。而后世的民间流传则改变了原故事的宗教理念，在各类通俗文学中，纷纷将吕洞宾斩黄龙和戏牡丹故事合为一体，兴趣点放在了阴阳采补上，流露出狎戏、斗法的世俗色彩。显然，这个故事在民间视野中被世俗化了。

13个八仙故事系统，13次沿波讨源、追踪摄迹，13条从宗教信仰、宗教文学渐进于民俗信仰、民间文学的演变轨迹，八仙故事逐渐拨开了历史的迷雾，呈现出清晰的面目。这无疑是本书奉献给八仙研究的最重要成果。然而，作者的学术设想并不仅限于此。“我们期待着经由八仙信仰研究这样一个学术个案，能够在涉及八仙信仰的各个学科领域形成一些经典性的理论，建构一定的研究范式，推动学科的理论发展。”^[1]（第7页）在为诸多章节作结时，作者经常卒章显志，点出自己对某种理论建构的精彩识论。像“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故事考论”，可以作为认识宗教对文学之影响的案例，“探讨宗教为文学提供了什么，形成了什么样的特征，以期能最终走向宗教诗学的建构”^[1]（第106页）；“雪拥蓝关故事”，则“作为一种神话叙事和民间叙事”，它的“复杂文本以及这些文本在不同文艺体裁之间的转换，为我们研究古代文艺的形式特征和叙事传统及其演变规律提供了理想的个案资料”^[1]（第404页）。文化的研究不仅表现为对历史叙事的客观呈现，而且也需要对这种叙事进行规律性的理论总结和主体性的价值判断。对此，作者的学术期待是宏阔的，思力和识见也是深刻的，他希望通过钟吕八仙等一系列个案研究，达到诸如民间文艺学理论、宗教诗学理论、文学史理论、古代文体理论、叙事学理论等重大理论的建设。

美好的设想总能激发我们的思考。以文学史的研究为例，传统文学研究习惯在作家、作品、主题、艺术风格等范畴内打转，整体思路和方法显得比较单一。然而，很多鲜活的文学事实都隐藏在静态的文本、文献之下，像一股滚滚的地下流，时隐时显，等待研究者去发掘。尤其对于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学现象，随着历时和共时的变迁，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传统“一碗清水式”的研究方式显然不太合适，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文学活动的客观形态，重新审视原有的方法和理论视角。像八仙文学就是一个典例，既具有宗教理念、信仰、仪式的内涵，又随着各个文化阶层的传播活动，渲染出不同阶层的文化精神。它的演变史，实际就是一种文学现象发生、发展的变迁史。因此，我们在观照一种八仙的文学文本或一个时期的八仙文学时，都不应仅就时代、文本而论，而需站在世代累积的大角度，并切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做出恰当的考察。文学史是活态的历史，是无数力量共同促进的流动的过程，当众多文学个案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向心合力时，也许文学理论的宏观构建就不再是一种纸上的设想。诚然，本书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册。作为一个预期的学术目标，路漫漫其修远兮，尚需作者和更多学人上下求索。据笔者所知，吴光正君近日正潜心整理《二十世纪“佛教与古代文学”论丛》，这恐怕也是他实现宗教诗学理论的其中一步。我们有理由期待他能一步步接近并最终达到自己的学术目标。

[参 考 文 献]

[1] 吴光正：《八仙故事系统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2] 浦江清：《八仙考》，载《清华学报》1936年第11卷第1期。